

南宋二王南奔对岭南经济文化的影响

邱树森

(暨南大学 中国文化古籍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630)

摘要: 宋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占领宋都临安,南宋益王赵昀、广王赵昺二王在宋臣护送下逃奔岭南,中国历代中原民众南迁浪潮出现新的高潮。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汉民族中的新民系——客家人更壮大、更巩固了。他们在岭南地区开辟耕地,发展经济,传承中原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为岭南文化逐渐具备传承性、多元性等特点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 南宋二王; 宋民南移; 岭南经济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4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627(2011)02-0005-09

在我们祖国南端的岭南地区,千百年来形成了独特的岭南文化。岭南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与中原文化一脉相通的传承性,由于它毗邻大海与海外长期沟通而形成的多元性。

730多年前,南宋最后两个皇帝为逃避元军追杀,曾从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一路逃奔至今岭南(包含香港、澳门)地区。随着大批中原人士南下,岭南社会经济和族群结构以及文化的传承均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南宋二王在岭南和南海的流亡活动

13世纪初,蒙古崛起于漠北。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各部,建立大蒙古国,开始南攻西征。1219~1225年蒙古西征,横扫欧亚各国。1227年灭西夏。1234年,太宗窝阔台灭金国。从1235年开始终于揭开蒙宋战争的序幕。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加速了灭宋战争的步伐。1271年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元。

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宋德祐二年、景炎元年),元军兵围宋都临安(今杭州),宋恭帝赵昀投降。陈宜中、张世杰等拥赵昀异母兄弟益王赵昀、广王赵昺逃奔永嘉(今温州北)。五月,赵昀在福州称帝,是为端宗。封弟广王赵昺为卫王。十一月,端宗奔福州、泉州。

(一) 二王南下广东

由于南宋残部在陆上节节败退,南宋二王被迫沿海岸不断南撤。1276年十二月,帝昀从潮州次甲子门(今广东陆丰甲子港)。次年春,宋将张镇孙一度收复广州,张世杰攻取潮州,进围泉州,文天祥北上江西抗元,形势一度好转。帝昀遂向广州靠近,宋将刘应龙引帝昀至广州港口,但被守江元军所阻,不得入穗。二月,帝昀进入今香港地区,首抵梅蔚山。四月,抵官富场。六月,抵古墟。九月,至浅湾。

收稿日期:2011-02-23

作者简介:邱树森(1937-),男,江苏苏州人,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澳门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蒙元史及中国民族史研究。

残宋小朝廷以官富为行朝,各地残军陆续收复闽粤沿海诸地后,元廷决定分兵讨灭之。1277年(元至元十四年,宋景炎二年)九月,元遣福建宣慰使唆都率军取南剑州援泉州,迫使张世杰从泉州撤围,退至浅湾,唆都连克濒海诸县镇;又遣左丞塔出率军入庾岭,十月进围广州,十一月下广州,杀宋将张镇孙,塔出遂与唆都子百家奴合兵进攻宋二王行朝驻地官富。

张世杰攻泉州不下,闽粤残宋所守城镇大多失去,故撤泉州之围退到浅湾,元廷遣元帅刘深率舟师来攻。是年十一月,宋丞相陈宜中、张世杰、殿前指挥苏刘义决定离开今香港地区,途径沙冲(今作沙涌,属珠海),以香山邑人马南宝家为宫室。原拟复驻浅湾,元将刘深来袭,宋师败绩,陈宜中等北上秀山(今广东东莞虎门),“中流大风,所统八百艘数千人俱溺,仅以身免”^[1]。十二月,次井澳(今珠海大横琴岛),“飓风坏舟几溺死(帝昺)几溺,遂成疾。旬余,诸兵士始稍稍来集,死者四五”^[2]。元将刘深复发兵袭井澳,张世杰力战却之,二王迁舟于谢女峡(今珠海小横琴岛)。刘深追至七洲洋(又作七星洋),夺宋船二百艘,俘帝舅俞如珪以归。

1278年(元至元十五年,宋景炎三年)初,宋军在井澳败后,陈宜中欲奉帝走占城(今越南南部),“先往谕意,南宝恸哭曰‘丞相不返矣’”^[3]。宜中果一去不复返。三月,帝昺欲迁占城不果,遂驻碣州(今湛江东南碣州岛)。四月,昺卒。诸臣立卫王昺为主,改元祥兴。五月,次厓山(今广东新会南,原为海岛)。张世杰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宫、军室数十余间。时宋军尚有20余万,多居于舟,资粮于广右诸郡,又招募工匠造舟楫、器械。

帝昺移居厓山后,形势急转直下。是年七月,元世祖忽必烈命张弘范为蒙古汉军都元帅、李恒为副元帅,自扬州水陆二道南征。闰十一月,俘文天祥于五坡岭。明年(1279年)正月,张弘范、李恒向厓山发起攻击。时南宋军有巨舰千余,拥兵20余万,又有“乌蛋船千艘救昺”;元军有大小船600余艘。元军先占领厓山,使宋军失去陆上退路,张弘范率水师断其南面及西面。二月,元军用火攻宋水师,宋舟船着火,丞相陆秀夫见大势已去,背负帝昺投水而死。张世杰突围奔南恩州(今广东阳江),三月后在海陵港(今广东阳江海陵岛)遇飓风,舟覆人亡。

(二) 二王在今香港和澳门地区的踪迹

港、澳地处珠江口,宋军西撤也必然经由港、澳。陈宜中、张世杰等护送二王自浙而闽,自闽而粤,在今港、澳两地逗留长达十个多月,是行朝南迁过程中历时最久的地方。如前所述,其目的在于等待广州的佳音,一旦广州形势好转,即可沿珠江北上,在广州建立行朝;如形势恶化,则南下入大海,遁于南洋国家,故陈宜中在井澳败后“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谕意,度事不可为;遂不反”^[4]。显然在入占城问题上,陈宜中与张世杰有尖锐分歧,张世杰护送二王至碣州(今多数学者认为在今广东湛江碣州岛),后在厓山覆灭。

陈宜中选择走占城亦不失为一种策略,因为元军攻势正猛,远走占城可以避其锋芒,伺机夺回江山。陈宜中选择此举显然是受了宋时海外交通发达的影响,南宋残部中有许多水手,熟悉海上通域外路线,而今香港、澳门地区便是南去海外的通道。据邓光荐《填海录》:“丙子(1276年)十二月,次甲子门。丁丑(1277年)正月,次梅蔚。四月,移广州境,次官富场。”二王在港所经过之地,有梅蔚(今赤沥角岛或青衣岛)、官富场(今九龍北佛寺)、古瑾(今牛地湾、九龍仔之间的古瑾村)、浅湾(今荃湾)等地。今香港地区的学者、市民对此颇为重视,除著名学者简又文、饶宗颐等专门撰文考证南宋二王南迁辇路、地区外,对遗址、文物亦有专门保护。香港九龍有“宋王台”刻石,其地辟为“宋皇台公园”,公园前大道称为“宋皇台道”。此外,尚有二王殿、土瓜湾、文椅石、侯王庙、赤湾皇陵等遗址。

景炎二年(1277年)十月,元将刘深攻浅湾,宋将张世杰战败,奉帝昺退秀山。宋将张世杰等知浅湾非久留之地,遂奉端宗昺西撤。从此进入今珠海、澳门地区。《厓山志·马南宝传》(〔笔者注:下面引文括号〕内为郭棐《粤大记·马南宝传》之字。两书大体相同):

宋景炎二年十月,端宗自潮之浅湾航海避敌〔虜〕,过香山〔邑境〕,南宝献粟千石以饷

军。端王敕奖之,召拜[权]工部侍郎。时帝舟为元师所迫。十一[二]月,丞相陈宜中、少傅兼枢密副使张世杰、殿前指挥使苏刘义奉帝沙冲,暂宫于南宝家,南宝竭力保卫帝躬,劳瘁备至。元人无知者。居数日,元兵陷广州,诸将招募潮居里民数百以行。……帝舟复驻浅湾,未至,元将哈刺歹及宣府梁雄飞、昭讨王天禄等来袭,世杰等与战于香山岛,败绩,将士被执甚众。陈宜中所统众尚数千人,舟八百艘走秀山,中流,大风坏舟,众多滋死,宜中仅以身免。十二月,张世杰奉帝舟退保秀山,寻次于井澳。丙子,飓风大作,舟败几坏,帝遂得惊悸疾。旬余,诸兵士稍稍来集,死者十四五。元将刘深复袭井澳,世杰力战却之。^[3]

二王是否经澳门的状况,今研究成果甚少,现经仔细阅读史料后,笔者认为确曾经过澳门。端王赵昀曾两次路过香山。第一次为景炎二年(1277年)十月,自浅湾至香山(今中山和珠海境),十一月,居沙冲马南宝家。第二次为当年十二月,从秀山过香山,次于井澳。其中第一次行程,香港简又文先生认为:

至帝昀等过香山之辇路,系在[香山]县东北之横门北口由海入内河西行,至蒲鱼洋地方舍舟登陆(大概所乘各舟即由内河转入岐江候驾)。时,马南宝闻讯,即率乡人前往迎驾,路经小涌(在沙岗之南),临时建一石桥以迎帝辇过此。后人称为“天皇桥”以纪念其事,至今仍存。帝等遂幸沙冲马家(即今马氏大宗祠)。驻蹕三日,闻广州陷,又出走。其所经路线系由沙冲西趋渡头村岐江南岸登舟(先由蒲鱼洋驶此候驾者),沿岐江南行,复出海赴井澳。(按:沙冲,今作沙涌,属中山县第一区,即良都,在石岐之南。)^[5]

此说如能成立,则帝昀第一次过香山,未曾经过澳门。但第二次过香山,诸书并未有路线之记录。第二次过香山的目的是奔井澳(大横琴岛),笔者认为帝昀是经过了澳门。其理由如下:《厓山志》《粤大记》等书均载,帝昀从沙冲退向浅湾时,遇元将哈刺歹等袭击,张世杰等与元军战于香山岛。此“香山岛”,有可能即今澳门或附近诸岛。以行军路线而论,宋军且战且退,一直退到井澳,香山岛是必经之地。故2000年澳门文化局所立《新禧重修永福古社碑记》有云:“澳门沙梨头永福古社,坊间传说为宋端宗行宫或陵寝故址。盖先朝遗民怀国忧思之所系歟。”

二王在澳门现在唯一的遗址是沙梨头永福古社。因此,似应首先解决澳门沙梨头永福古社是行宫还是陵寝。

澳门沙梨头麻子街今存一土地庙,一说为端宗行宫,但缺乏文字依据和实物证据,待考。笔者以为沙冲马南宝在此建端宗疑冢可能性更大。据《厓山志·马南宝传》(《粤大记》略同):

景炎[三年]春,都统凌震复广州。……时帝舟次于化州之碓州,疾大作。四月,帝崩。卫王昀即位。走厓山,张世杰等从之,而曾渊子充山陵使,奉帝还殡南宝家,伪为梓棺出葬,其永福陵在厓山也。今香山地方多有陵迹,盖遗黎为之,讳其处云。(《厓山志》注:南宝募人为疑冢于寿星塘五处)^[3]

这段记载,明白地告诉我们“永福”之名为端王寝陵之名,沙梨头“永福古社”与此正合;端王之冢在厓山,马南宝为保护帝昀之墓“伪为梓棺出葬”,在香山地方深山中建疑冢多处。沙梨头永福古社依山傍水,更有可能是帝昀疑冢所在地。

二、二王南奔对岭南人口结构的变化

蒙元在灭亡南宋几十年过程中,中原地区战乱不断,元军到处杀戮、掳掠,广大中原人民蒙受了巨大的苦难。尤其是元军占领临安后,为加速歼灭南宋残部,战争更加残暴。广大人民群众被迫进行激烈的反抗斗争,随着蒙元军队不断南压,中原之民及南方之民,不得不背井离乡,举家南迁,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南迁移民浪潮。这些移民的后裔今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江西等地。

(一) 随二王南迁的南宋军民

元军占领南宋都城临安后,是、昺二王南迁,南宋皇族及诸大臣随之南下。如度宗时官至左丞相兼枢密使的名臣江万里,德祐元年(1275年)元军破饶州(今江西波阳)时,赴水死,弟万载时任殿前禁卫军指挥使兼摄行中军事,率江氏家属随二王南迁,辗转各地;又如爱国诗人丘葵隐居泉州海岛,遣其子德玄随宋将张世杰入粤,后迁海南岛,为丘氏入琼始祖,其五世孙即明代大文学家丘浚^[6]。此外,还有许多护送二王南下的宋军,主要有张世杰、文天祥等勤王之师;入广东后,各地义军参加宋军的也不少,如景炎二年(1277年)初,二王驻潮州,“时正军十七万,民兵三十万有奇,内淮兵二万”^[7]。所谓“淮兵”,即张世杰所率部队。即使到了景炎三年(1278年)五月帝昺即位时,当时宋兵尚有数十万^[7]。宋亡后,这些来自广东以北的中原人士大部分留在广东了。其子包括宋皇室后裔赵氏家族、文天祥后裔文氏家族、陆秀夫后裔陆氏家族等。赵氏皇族后裔(太祖系、太宗系、魏王系)至今仍散居于广东珠海斗门、江门新会、东莞等地。

(二) 畚民与蛋民的南下

畚民是我国少数民族畚族。唐宋以来,史书上多称畚族为“畚民”或称“鞞民”。他们自称“山哈”,意为居住在山里的客户。宋时,畚民主要分布于汀州、赣州和潮州等地的畚洞中,南宋末时,他们“党与相聚,声势相结,负固保险,动以千百计,号为畚民”^[8]。在元军南下时,潮州、汀州、赣州、漳州等地区的许夫人、陈吊眼等组织畚军,支持南迁的二王,反抗元军。“许夫人者,潮州畚妇也。……景炎元年,蒲寿庚叛,宋帝昺趋潮州。张世杰遣人招纳义军,夫人倡率诸峒畚户应命。二年六月乙巳,世杰自将淮兵讨寿庚于泉州,夫人遂与剧盗陈吊眼各率所部往会,兵势稍振。……元兵攻浅湾,夫人复率兵海上援之,至百丈埔,遇元兵与战死,士人义而祀之。”^[9]嗣后,陈吊眼屯戍漳州山区,攻入漳州,杀元官,至元十八年(1281年)兵败被杀。后来建宁黄华、钟明亮,广东董贤举,福建长泰丘大老等响应起义,势相联结。南宋二王残部曾招募畚民为兵,所以畚民随着二王政权南迁。元灭宋后,元廷对畚民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或招募他们为乡兵,或加以遣散,大体由闽南迁往闽北、闽西一带;或西迁江西,其中不少迁入江西宁都;迁入广东者,多进入粤北和珠江三角洲一带,有的融合在广东客家中。

蛋民是指在海边养珠、捕捞海产品的船上居民。他们誓与南宋政权共存亡。祥兴元年(1278年)四月,昺卒,诸臣立昺为帝。五月,张世杰迁残宋于厓山(今广东新会南),以厓山作为最后根据地。七月,元世祖忽必烈命其将张弘范为蒙古汉军都元帅、李恒为副元帅,自扬州水陆两道南征。闰十一月,元军俘文天祥于五坡岭。明年正月,张弘范、李恒向厓山发起进攻。时南宋残部有巨舰千余,拥兵20余万,又有“乌蛋船千艘救昺”,显然救援厓山残宋政权中有许多蛋民。二月,元军用火炮击宋水师,宋丞相陆秀夫见大势已去,背负帝昺投水死,宋亡。可见,蛋民死于厓山海战人数不少。另有一部分他们在厓山战后溃散于民间,或成为广东的蛋民。

(三) 向广东迁徙的客家人

客家是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中一支向南中国移民运动中产生的民系,它与整个汉族同根同源。客家人的形成虽有漫长的历史,但大批迁入岭南地区,宋元之际则是重要历史阶段。中原汉人因战乱、灾荒或王朝更替,从豫、鲁、鄂、皖辗转南徙,宋元之际正逢蒙元南侵,蒙元军队在征服汉地时大肆杀戮,不满蒙元统治的汉民随南宋二王南下,南宋爱国军民也多在赣、闽等地组织抗元武装。赣、闽地区原本就居住着许多客家人,这里山峦起伏,林木茂盛,土地肥沃,许多中原汉民在此啸聚山林,与当地畚民结合,开展抗元斗争或逃避元兵欺压,南宋爱国将领从中原南下,多在闽、赣地区招募士兵,保卫二王政权,二王失败后,这批移民大部分成为广东的客家人。

赣南和闽西地区历史上曾是孕育客家民系的摇篮。这里地处赣江上游,素有“南抚百越,北望中州”之称。宋元之际,这里又成为客家民众南下广东的主要来源。他们南下广东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由赣南渡大庾岭达到南雄,再由南雄南迁广东各地。这条路线,早在宋金之际已经形成,

清人屈大均说“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盖祥符(北宋都城开封——引者)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粉榆(汉高祖故乡,今江苏丰县北)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以志故乡之思也。”^[9]到宋末元初时,通过这条路线南下的中原移民仍然很多。根据历来研究客家的专家收集到的家谱资料,宋元以来南迁的中原移民,散居广东各地,其中“北有清远的朱,增城的刘;东有东莞的张、李、陈、刘;南有恩平的梁,新会的区、李、麦、陈;西有阳江的司徒等。其余诸姓则分布于南海、番禺、顺德、香山、鹤山等诸县。而诸姓比较集中的居地,则是南、番、顺、香、东、新等六县”^{[10][268]}。今天岭南地区人口中之所以有那么多客家族群,正是历代汉民从中原地区移民而来的结果,其中宋元之交随二王南下是重要的历史时期。另一条路线是由赣南迁至闽南、闽西,再迁入广东梅州等地。

我们还要重视港澳地区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也有大量移民前来定居。据现存新界各姓族谱,宋元间入住香港新界者计有邓、彭、林、廖、陶、侯、吴、文八姓,多定居于屯门、衙前围等沿海地域和锦田、大埔、龙跃头、粉岭、屏山、上水等内陆谷地^{[11][89]}。他们为历史上香港地区的开发作出了贡献。澳门也有大量居民移入,沙梨头“永福古社”初建于明初,这就说明在明初蒙元政府被汉人推翻后,当地居民不忘南宋二王故建此社以为纪念,尤其是庙内有楹联曰“脉接雄关远秀,灵敷镜水长清”,更寓有宋帝南幸之意。正说明了“先朝遗民”怀念祖宗之情感。

三、南宋移民对岭南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

(一) 南宋移民与岭南经济的开发

南宋二王被消灭后,江南人民以不屈不挠的精神继续掀起反抗元朝的浪潮,至元二十年(1283年),刑部尚书崔彧上书曰“江南盗贼,相挺而起,凡二百余所”^[12]。二十三年(1286年),侍御史程钜夫说“江南自归附以来已十余年,而偏远险恶去处,盗贼时时窃发。”^[13]可见,包括岭南在内的江南地区各族人民在宋亡后继续抗元斗争的形势非常严峻。在这样的形势下,元朝统治者为避免江南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抗,下令废除南宋诸多科差,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更下达命令,规定对江南浙东、福建、湖广各地夏税依亡宋体例交纳,而反抗最强烈的两广地区则免收夏税:

大德元年三月行省准中书省咨:元贞二年九月十八日奏过事内一件节该:江南百姓每的差税,亡宋时秋、夏两遍纳有。夏税木棉、布、绢、丝绵等各处城子里出产的物折做差发斟酌教送纳有来,秋税止纳粮。如今江浙省所管江东、浙西这两处城子里,依着亡宋例纳有,除那的外,别个城子里依例纳秋税,不曾纳夏税。江南的多一半城子里百姓每比亡宋时分纳的如今纳秋税重有,谓如今收粮的斛比宋文思院收粮的斛抵一个半大有,若再科夏税呵,莫不百姓根底重复么!两广这几年被草贼作耗,百姓失散了有,那百姓每根底要呵,不宜也者。浙东、福建、湖广百姓每夏税依亡宋体例交纳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钦此。^[14]

《大德南海志》也有类似记载:

宋行雇役之法,故于田税之外,又有夏役、秋役、茶钱、赏给之需;商税之外,复有地基、河渡、河场、经制之目,名件不一,民以为病。圣朝混一,首以宽民力为第一义,凡宋无名之赋,一切蠲除之。广为极边,愈加优恤。惟种田纳地税,买卖纳商税,商税三十税一,鱼盐舶货之征,随土所有,自此之外,秋毫不扰。^[15]

上述优惠政策的推行,岭南受惠最多,这是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当然,这是江南人民,尤其是岭南人民经过与统治者抗争得来的。

宋民南迁对岭南的经济开发也起了很大作用。中原之宋民南下岭南时,其地早已有原住民和秦汉以来南迁之北方人;宋金时代南迁之人,屈大均认为“至止南雄”,即自赣、闽一带南迁入粤之

人,大体在粤北一带定居;而宋元之际南下入粤之人又从南雄珠玑巷继续南迁,“开辟烟瘴……永镇南方,子孙万代,为国栋梁,文经武纬,愈远愈昌”^[16]。岭南道南雄府为使这批移民分散到珠三角地区,特给他们发给由引,《本府文引》中说“为逃难给引,早救生灵”,“因思近处无地堪迁,远闻南方烟瘴,地广人稀,堪辟住址”^[16]。当时珠三角地区还是“地广人稀”之地,经过原住民和大批移民的辛勤开发,元代以来岭南户口大增,试以广州为例,《大德南海志》称“自王师灭宋平广以前,兵革之间,或罹锋镝,或被驱掠,或死于寇盗,或转徙于他所,不可胜计。至元二十七年,朝廷籍江南户口,方见定数。比年官府肃清,盗贼宁息,人皆安生乐业,故广之生齿日蕃,户计日增矣。”据该书记载,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时广州户172 284,大德八年(1304年)增为180 873^[17]。经过土著民和移民的努力,至大德年间广州已发展成为物产丰富、粮食充足之地,加之海上交通发达,广州官民甚至将大批粮食出口海外谋利。

珠江口两颗璀璨的明珠——香港和澳门,其中澳门早在16世纪中叶为葡萄牙人租居,1859年为葡人强占为殖民地;香港在鸦片战争后为英国人占为殖民地。其实远在殖民主义者占据之前,该两地已为粤人所开发。

今香港九龙地区早在唐宋时即有建置,唐人贾耽《考方域道里》中说“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可见屯门已成为广州到南海航行的必经之地,故唐时在屯门设镇驻兵,“置屯门镇兵,以防海寇。……宋亦置营垒于此”^[18]。五代南汉刘铤设媚州都于今吐露港至大屿山一带,招募专户彩珠。北宋中期在今大屿山置海南盐栅,南宋绍兴末升为海南盐场。宋元时在官富场建有天后古庙和税关^[19]。因为其地早已成为海道要地,产珠、产盐,有商业活动,故建有妈祖庙和税关。所以二王留居香港前后达十个月之久,可见当地已具备供给一、二十万宋兵的经济实力。宋亡后,南下移民迁居香港者更多。

澳门早在新石器时代即有古人居住。宋末,香山县沙涌人马南宝在景炎二年(1277年)十月,当帝昀自浅湾航海避敌过香山时,“南宝献粟千石以饷军”^[3],可见马南宝拥有粮食之充裕。明万历年间郭棐的《粤大记》附图中澳门半岛与井澳之间有“旧盐场”,既是“旧”盐场,当是开埠前(宋元及明中期前)已有的盐场,也就是说香山澳早就有盐业生产了。南宋二王在今珠海澳门的活动,再次可以证明宋元时期这里的生产活动并不低下。居于今中山、珠海的马南宝,竟能在景炎二年(1277年)“献粟千石以饷(宋)军”;后来又“召募潮居里民数百以行”,这也是不小的数目,数百人吃喝也会用去许多粮食。当时陈宜中尚有数千人、舟八百艘,从香山走秀山,又从秀山退守井澳,需要多少粮食才能保证部队的给养,如果当时的香山没有相当物质基础,宋军是难以生存的。次年四月,帝昀卒于碙州,灵柩运至马南宝家,南宝“伪为梓棺出葬,其永福陵在厓山也。今香山地方多有陵迹,盖遗黎为之,讳其处云。”《厓山志》加注曰“南宝募人为疑冢于寿星塘五处。”^[3]可见澳门沙梨头“永福古社”实为帝昀之疑冢,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有“遗黎”在此守陵,这就是厓山之战前后已有粤人在此居住的明证。入明后,澳门居民不断增加。据澳门开埠后不足二十年的万历八年(1580年)统计,澳门华人已达二万人^{[20][85]}。

(二) 南宋移民对岭南文化的影响

宋元之际大批中原汉民南迁岭南,使岭南地区已有的中原文化更加深入发展,并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形成了多元文化的特点。岭南文化之所以具有这些特点,究其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 岭南客家具有爱先祖、爱故乡的优秀品德。

自秦统一七国在岭南设郡,中原移民就开始南下了。黄榆《双槐岁抄》云“自汉永安至于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深,故习渐变,庶几中原。”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更描述了移民对先祖和故乡怀念之情。他说:

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盖祥符(北宋都城开封)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粉榆(汉高祖故乡,今江苏丰县北)所自,亦号其地

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志故乡之思也。^[9]

爱先祖、爱故乡这是客家人的优秀品德,也是中原文化得以在岭南传承的重要原因。如前文所述,香港虽在英国统治下百余年,但香港人民并没有忘记南宋二王留下的历史古迹,今九龙公园内有“宋王台”刻石,公园前大道称“宋皇台道”;香港还有二王殿、土瓜湾、马头围、文椅石、侯王庙、赤湾皇陵等古迹。澳门沙梨头土地庙是在明洪武年间“永福古社”基础上重修的。庙中有楹联“南尽天涯职责新图登里版,北来地轴山川匡气入神壘”,庙内又有一联,“脉接雄关远秀,灵敷镜水长清”。两联显然寓有本澳为中华大地的延伸之意。从港、澳两地保留的南宋二王遗迹不难看出,当地的“遗黎”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祖国认同感是代代相传的。

第二,南宋移民十分重视教育,使岭南人培养子孙成才,因而人才辈出,传统文化得到传承。

宋代文化发达,儒家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是宋代士人不可动摇的信念。宋人南下后故国已亡,士人多不愿做新朝官员,他们以传授学业的方式来培养子孙后裔,使传统文化得到传承。

南宋移民以子弟用功读书为家范。以《赵氏家范》为例:

一、子弟学业未成,不许食肉饮酒。

二、子弟自八岁入小学,十二岁出就外传,十六岁入大学,当延明(名)师教诲,必以存孝悌忠信为主,期抵于道,仍延迎礼法之士,时相亲友。^[9]

由于南宋移民特别重视教育,因而元代岭南的私学和书院较宋代有了进一步发展。

私学是指在家中教育子弟和私人在家中招生培养。元代岭南地方私学之风非常盛行。例如番禺黄岐角张氏,世代研究《周易》,宋代就负有盛名,人称“黄岐张氏”。自宋绍兴年间[张]纲始,传子飞一,飞一传二子彬甫、邻甫,彬甫传子复礼,复礼“于[易]学尤精,发为大义,顷刻千余言,出入程朱二氏,无乘迅者。汉儒拘泥不通,或流于术数,痛麾斥之。学成,不求仕,念居村疇”^[22]。复礼有弟度、峻、熙等人,都是元代著名的经学家,以学业闻名于时。元代学者也常在家中办学,如增城陈大震,从游者甚众;南海人区适,以博学闻名于时,“从游者数百人”^[22]。

书院之设始于唐代,盛于两宋,入元后由于民间儒生很多,书院之设更盛于前代。清人朱彝尊《日下旧闻》说“书院之设莫盛于元……几遍天下。”据统计,岭南地区新建的书院就有顺德桂洲的翠岩书院、广州的濂泉书院、东莞的聚秀书院、新会的古冈书院、海丰的海丰书院、番禺梦冈的玉踰书院。岭南人重学的传统在岭南边远地区也得以传承。香港九龙地区在元明清时期也是书院书社林立,如锦田的周王二公书院、二帝书院,屏山的覲廷书室等^{[23][28]}。

第三,岭南人中精英辈出,他们始终不忘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宋亡后,南宋入粤移民中虽多有饱学之士,但他们坚持拒绝入仕,隐迹埋名,遁居山林,如增城陈大震、廖金凤,东莞李春叟、何文季、赵必瑑、赵东山、赵时清、翟宠、陈益、陈庚、刘宗、张衡、方幼学、李佳、文应麟等,番禺邵继贤,顺德罗铸夫,南海区适、黄哲、丰诤,新会黎贞等,由于他们入元后社会地位低下,且较为贫穷,因而虽有许多著述,大多未能出版传世。他们对子弟的要求是严格的。由于读书好学的风气在岭南人中蔚然成风,因而元、明、清三代岭南人(特别是客家人)中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如东莞赵必瑑为宋王室后裔,其子赵良骥“生而凝重,好读书,不屑于章句之末,惟求大义所存,必瑑器之,曰:此子能读父书”^[24]。可见其教育子弟之严,因而传统文化能得以传承。又如:回回人蒲寿成为宋末诗人,其弟寿庚以泉州降元,寿成则弃官居羊城(今广州),“与岭南诸名士结‘白云诗社’”^{[25][141]}。白云诗社是诗人自己组织的社团,带有专业性和普及性,他们切磋诗词,对提高岭南诗文水平无疑有很大作用。寿成有《心泉学诗稿》传世。其孙名万全,字孟成,号守发,随父迁顺德,他“日事耕耔,夜事咿唔;枕胙六经,淹贯百子;茅庐积学,不乐登庸,半儒半农,幽芳自赏”^[26]。元末,顺德人孙贲、南海人王佐等结诗社于南园(故址在今广州文德路),开“抗风轩”以延名士,盛况空前。足见元代岭南文坛到元末时已由衰转盛了,移民的后裔在

家庭、学校长期熏陶下,涌现了许多人才。明人罗亨信,东莞人;陈献章,新会人;屈大均,番禺人;清人康有为,南海人;梁启超,新会人……他们的先祖都是南宋以来,经南雄南迁之人的后裔。^{[10][272]}也是客家人中值得骄傲的文学家、哲学家、历史家、改革家。如移民海外的客家人,也保持了客家勤奋好学、勇于开拓的精神。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就是移民海外的名人。据1411年重修《李氏族谱》:“则知李氏乃陇西人也。因祖翁宦游至汀,遂家以汀之宁化属地李家坊。宋季鼎沸,火德翁徙于上杭之胜云里丰郎乡宅柱石而居焉。”又据后续族谱,知李氏明时移居广东梅县、海阳县、丰顺县、大埔县,清时远徙海外^{[27][36]}。

第四,岭南客家人具有不断进取、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品质,因而为岭南文化形成多元性作出了贡献。

岭南濒临大海,拥有众多天然良港和漫长的海岸线,因而具有接触外部文化的天然条件。早在西汉时期,广东合浦、徐闻就已开辟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直达印度;唐代贾耽所著《皇华四达记》中载有广州通海夷道。唐宋时来自阿拉伯、波斯诸国的穆斯林常留居广州不返,累世定居,所生后代,宋代称为“土生蕃客”,有的甚至已是五世以上。岭南客家人既来自中原地区,因而也是“外乡人”,所以他们从不排斥从海上来华的穆斯林“蕃客”。广州市内有蕃客聚居的蕃坊,蕃坊中有蕃市、蕃学,还有清真寺,它们成为与岭南人和平相处的穆斯林社区。到了元代,蒙古人一统天下,住在中国的各色人种都是“皇帝民户”,不再分为“蕃客”、“化外人”,政府设“回回哈的司”专掌穆斯林宗教事务,元仁宗时下诏“哈的大师每只教他每掌教念经者。”^{[28][327]}这项措施,有利于回回人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而当地人也能更好地接受和理解伊斯兰文化。以广州为例,自唐代在广州“蕃坊”中建立中国最早的清真寺怀圣寺以来,历史上未有岭南人破坏怀圣寺建筑的记载,却留下了许多在岭南居住的客家人对光塔、怀圣寺的记录,赞美光塔、怀圣寺是广州的一大名胜古迹。明末清初岭南人屈大均《广东新语》、清仇池石《羊城古钞》等均有详细介绍。

明清以来,早期欧洲国家开始来华,同时也带来了欧洲近代文明。不论在岭南的外地宦宦,还是岭南当地人,对欧洲文明多不持排斥态度。15世纪中叶,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后,为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带来了契机。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到肇庆传教,成为传播西方文明最早的西方人。在肇庆知府王泮等岭南地方官员的帮助下,将西方的天主教、自然科学(天文学、地理学、机械学、光学仪器、西医)、艺术等传入中国,使中国人大开眼界,出现了瞿太素、徐光启、李之藻等一批接受西方科学的中国科学家。广东由于得风气之先,中国最早接受西方科学的地方就是岭南,利玛窦在肇庆接受王泮的请求,将他带来的世界舆图,改成“把北京作为中心子午线。”该图由中国的官方翻译成汉文。王泮又自己垫资令人于1584年10月“铸版”出版^①。这本在肇庆刊印的《山海舆地图》是中国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汉文世界地图。由于澳门开埠,中国学会了西方的制炮术、天文仪器、自鸣钟等,这些都是在岭南首先制成的。在宗教方面,利玛窦等将天主教传入中国,中国内地和澳门的天主教徒大增,到1644年时,内地天主教徒已达15万人,而澳门居民中则有4万人之多^{[29][41-45]}。到清乾隆时,清政府虽厉行禁教,但澳门天主教仍很盛行,广东“各县每年一次赴澳进教”^[30]者仍很多。19世纪初英国人马礼逊将基督新教传入中国,先到澳门,他请广东人杨善达教中文,后到广州,在华人中传教,最早入教者蔡高和肇庆高明人梁发,梁发是华人第一个牧师,而且是第一个全家信奉基督教的中国家庭。他用中文编写的传教丛书《劝世良言》等影响很大,受该书的启发,洪秀全于1843年创立拜上帝会,组织太平天国运动,掀起了推翻清朝的农民运动。

岭南是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的第一站,西洋文化和生活方式绝大部分先传入广东,然后再向北方推进。岭南人素有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也素有吸收外国文化的习惯。明中叶以前与

① 参见米歇尔·德东布《入华耶稣会士与中国的地理学》,载安四朴、谢和耐等《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耿昇译,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230页;黄时鉴、龚纛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岭南人交流的主要是南洋、中亚、西亚人,澳门开埠后西方人带来了先进的科技和基督教文化,东西不同的文化和道德观从此发生了交往。在岭南的许多知识分子深深感到西方科技和生产发展水平已超过中国,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于是一批批掌握西方科技的科学家、懂得西方哲学的思想家、学会西方语音的翻译家、善于西洋画和西方音乐的艺术家的宗教家,在岭南涌现了。从此,岭南人固有的开放性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于是在近代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关系到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政治家,其中包括创立拜上帝会的洪秀全、撰写《资政新篇》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洪仁玕、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等。岭南地方还涌现了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西医学家黄宽、启蒙思想家黄遵宪等等。

我们在前面所举的人物多是岭南客家人。有人说,近代以来,广东客家人出现了“名人爆炸”^{[27][86]},为什么岭南人会出现这么多名人?其原因就在于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从北方迁到最南方的边陲之地的客家人世代代遭受了战乱,最深刻地体会到中华民族的苦难,怀念自己的故土,热爱自己的国家,具有在恶劣的环境中建设自己的家园,富有追求真理、追求自由的优秀品质。

参考文献:

- [1] (明)黄淳等撰.匡山志·卷七:楚庭稗珠·宋末遗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 [2]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十七:二王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3] (明)黄淳等撰.匡山志·卷六:马南宝传[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 [4]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一八:陈宜中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5] 简又文.南末二王南迁辇路考[M].香港:香港大学出版,1957.
- [6] 琼山丘氏族谱[M].1980年修.
- [7] (明)黄淳等撰.匡山志·卷一:端宗皇帝[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 [8] 大埔县志·卷三〇:人物志[M].1943年修.
- [9]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珠玑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0] 陈乐素.珠玑巷史事[A].求是集(第二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 [11] 黄国健.香港历史与社会[M].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4.
- [12]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七三:崔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3]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一〇:公选[M].清宣统庚戌阳湖陶氏涉园刊本.
- [14] 元典章·卷二四:起征夏税[M].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元刻本,1972.
- [15] (元)陈大震.大德南海志残本·卷六:赋税[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 [16] 黄慈博辑.珠玑巷民族南迁记[M].稿藏广东中山图书馆.
- [17] (元)陈大震.大德南海志残本·卷六:户口[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 [18]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〇一:杯渡山[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19] (清)顾炳章辑.勘建九龙城炮台全案[M].广东省图书馆藏.
- [20] 吴志良.生存之道[M].澳门成人教育学会,1997.
- [21] 泉州赵宋南外宗正司研究会编.南外天源赵氏宗谱[M].1994.
- [22] (明)黄佐.广州人物传·卷十一:吏部尚书张公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影印本,1995.
- [23] 方骏,熊贤君,主编.香港教育通史[M].香港:香港龄记出版有限公司,2007.
- [24] 陈伯陶.宋东莞遗民录·卷上:赵处士传[M].1916.
- [25] 南海甘蔗蒲氏家谱[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 [26]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八五:孙賚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7] 谭元亨.千年圣火——客家文化之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 [28] 黄时鉴点校.通制条格·卷二九:僧道·词讼[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 [29] 郑炜明,黄启臣.澳门宗教[M].澳门基金会,1994.
- [30] (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上卷:官守篇[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

【责任编辑 丁万录】